

马寅初对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解与把握

马大成

(马寅初纪念馆 杭州 310006)

摘要:新中国初期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政务院号召,高校知识分子自动发起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北京大学系全国高等学校的模范,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自然成为运动的推动者。以往的研究中,肯定者多论马寅初的积极态度与贡献,而近年反思“思想改造”的文章则视之为政治干预学术的开端。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均缺乏当事人的原始资料。本文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发现马寅初对“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他既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又与政府的设想有所不同,至于运动中发生的“洗澡”现象,就更非其所愿了。

关键词:马寅初; 政治学习; 思想改造;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505(2012)02-0066-06

新中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北京大学教师为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而自动发起的,由政务院、教育部发动的目的性明确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自然成为运动的推动者。关于这次运动,一方面是“正史”有意规避,原始资料鲜有披露;另一方面因档案资料尚未开放,学界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和研究相当欠缺,故而对马寅初在这次运动中所处的角色,及思想、态度的认知不够深切。本文通过原始资料的发现与研究,感到马寅初对“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与人们以往的看法与评价颇有些不同。研究马寅初对运动的把握以及运动实际展开中的出轨与失控,于我们深入认识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震荡与转折,是有所裨益的。

—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现象”为蓝本的。该模式的一个特征即通过政权力量要求全民思想统一,素有思想自由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自是思想改造的对象。因此,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权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课题,而知识分子也因个人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出现分化。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暂放共产主义纲领而行新民

收稿日期:2011-10-03

作者简介:马大成,男,浙江嵊州人,马寅初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马寅初研究。

主义,赞成资本主义发展和思想言论自由,加之当时国民党政权对思想言论的钳制,争民主、争自由成为知识分子的斗争目标。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代表的马寅初,正是在这个共同点上与中共走到一起,结为同盟,成为中共及周恩来最可靠的党外知识分子朋友。

新中国建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对即将到来的巨变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而马寅初以自己多年与知识分子的相处,以及与中共交往的经验,清楚地认识到,新政权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势在必行,与大部分知识分子跟不上这种形势的要求存在矛盾。他希望扮演一个沟通双方的中间角色,用温和、渐进的方式,让知识分子认清新形势,跟上新时代,而中共高层也正需要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担当此任。于是,1949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际,中共即任命马寅初为位于刚解放的杭州的浙江大学校长。果然,马寅初不负各方所望,积极引导知识分子迈入新道路,融入新社会。在一年零八个月的任期内领导浙大进行了多项改革,反映了他对教师政治学习的重视和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思想的态度。

创建“校代会”。马寅初入主浙大方针明确,即把浙大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到校后,与浙大每一位老师单独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困难,尤其重视青年教师的意见,听取他们对学校的组织、行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职工生活等方方面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1950年4月1日,浙大校史上的创举“校代表大会”成立,马寅初要求全校师生“人人提提案,个个想办法”,代表大会发挥了师生员工当家做主人的精神,收到意见、提案900多条,不但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加强了师生团结。

设立“政治课委员会”。1949年9月,马寅初倡议设立“政治课委员会”,开设政治思想课,请沙文汉、林乎加、商景才等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前往讲课,继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并亲自授课,讲解《共同纲领》、“三大宪章”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等,加深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和对祖国的热爱。又分批选派浙大教员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以推动全校师生员工的政治学习,改进学校的政治工作。他还倡议“浙江省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会”,简称“高教联”,亲任主任委员。高教联发动教职员上街宣传公债和踊跃认购公债;举办暑期教职员学习会,组织学习国际形势、财政经济政策、土改政策、文教政策等党的方针政策。

支持学生创办民众夜校,倡导“工读运动”。马寅初号召师生“今后学校教育,应面向工农……革命知识分子应学习工农的革命性,工农要向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科学知识,以适应祖国建设的需要。”1949年11月15日,浙大学生服务部经过1个月的筹备,所创办的浙大民众夜校举行开学典礼,参加的工农学生280多人,马寅初到场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要有始有终,还让他的次子马本初为夜校学生授课。

马寅初在浙大的教育改革,说明他是新中国初期真心诚意拥戴共产党,渴望改造旧思想、旧教育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为他出任北大校长,成为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推手奠定了内外基础。

二

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任务,1950年,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继又召开了高等教育会议。会议决定:高校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对高等学校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对院系进行调整。实施中,全国高等学校虽进行了若干改革,教师们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进步,但高教系统的改革还是赶不上其它战线的日新月异。多数教师在政治纲领上已能接受新民主主义的国策,但在教育思想、治学观点、工作习惯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民国大学的自主自由之风。中共高层认为,旧中国留下的教育必须改革,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但是不能硬来,需寻求一个适当的时机与方式。毛泽东说“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

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1]北京大学自“五四”以来为德高望重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在学术领域处于全国高等学校领导地位。由北大带头实施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可开全国风气。那么,校长的人选即是关键。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慎重选择,一致通过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对按新教育方针办校有着清醒的认识与高度自觉,上任伊始,便着手推动知识分子改变认识的政治学习。

举办暑期职员政治学习班。马寅初履新北大已近暑假,经过谈话和了解,认为北大的大多数师生的思想是进步的,唯职员的思想比较落后,遂征求汤用彤、罗常培等的意见,决定举办暑期职员政治学习班。1951年8月1日,马寅初到学习班进行动员,讲了三个意思:(1)政府交给我们北京大学的任务,是要做全国的模范。搞不搞得好的,要作一个试验;(2)北大将来要有一万学生,今年要有四千学生,明年开始迁出城去,学生渐渐变成工农出身,我们教授也要以工农的立场、感情来教学;(3)学习的必要性和强迫性,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2]这篇讲话反映了马寅初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初的理解。核心思想是两个方面的,一是要知识分子切实认识时代之巨变,原有的知识、思想和处世方式必须跟着变,不自觉地变便会出现强迫地变,与其强变不如自变;二是期望通过学习逐步转变认识的方式,达到目的,而不是政治和强制的办法。

8月31日,北大校务会议总结暑期政治学习成绩时,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自我改造的号召,主动提出把政治学习扩展到教员中,发起北大教员思想政治学习运动,通过学习,对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进行彻底的批判,建立起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促进学校的教育改革。会议一致认为,教师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如何开展,意见不一致,有人还提出要达到“忠诚老实”。从这次会议内容看,政治学习的调子有所提高,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联系起来,这与来自政府与意识形态的导向与压力有关。如此定调,与马寅初的初衷不尽相同,于是有了他的致周恩来信。

就北大发起教员思想政治学习运动致周恩来信。1951年9月3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十二次会议。会议结束,马寅初向周恩来汇报北大暑假职员政治学习成效,决定发起北大教职员政治学习运动,并陈述五点意见:(1)思想改造运动,应由业务机关教育部发起,北大是教学机关不合适;(2)这次政治学习,以达到思想改造为目的,不宜搞忠诚老实运动,在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前,不可能做到忠诚老实;(3)这次政治学习,是教员自动发起的,甲教员以团结互助的精神帮助乙教员,必为教员们欢迎;(4)这次政治学习,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只涉及教员的个人思想,而不应涉及他们的政治历史,否则必不为教员们欢迎;(5)这次政治学习,北大若办得好,全国高校起而效法者必很多,这个运动就可普遍地开展。”这封以前从未面世的信函,代表了马寅初对“思想改造运动”全盘的理解与把握。其中几点含义值得解读:其一,北大不宜带头发动,说明对运动后果有所顾虑;其二,希望运动为教员自觉自为,行政干预、强制色彩尽量减少;其三,不要搞交待、查历史根源之类伤及知识分子体面尊严的名堂,这是保持“斯文”的底线。以上,与运动进展的实际情况及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知识分子情形,可谓天差地别。马寅初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遂进一步提出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去北大作报告,以推动政治学习运动的开展。周恩来嘱马寅初写成书面意见呈报,对于请毛泽东演讲,可拟放在怀仁堂举行。谈话结束已是晚宴时间,周恩来安排马寅初在毛泽东身边就座。马寅初将北大开展政治学习的情况简要汇报,并请主席为教员们作演讲。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次日,马寅初召集校务会议,将总理赞成他提出的五点意见向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员传达,得到一致赞同。众人议决这次学习运动以改造思想为目的,不涉及个人政治、历史,并郑重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

9月7日,马寅初将自己的五点意见及北大教授的讨论情况写成一封长达八页的信呈周恩来。9月9日,周恩来在信上批示“马老来信送毛、刘、朱、董、陈、彭真、乔木、俊瑞传阅。在上次政府委员会开会后,马老提及此事,我告以有一两个同志前往讲演即可。请主席讲演,我告以当代为转达。他又提到听讲的教职员和学生当达到两千人,我即告以主席向这样的人讲话,精神负担极大,最好请别的负责同志讲演。谈话后即送马老至主席桌上会餐,不知马老提及此事否?请告。请其他同志讲演事,我意请彭真、乔木两同志各担任一次。如少奇同志能讲一次,当能满足马老的热切要求,亦请告,以便复马老。先转给毛主席。”9月10日,刘少奇批语“我不讲演了。恐亦不需要很多讲演,可选择一些文件学习。”9月11日,毛主席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①

马寅初在给周恩来的呈信中,及与教育部长马叙伦的谈话中,或在北大的内部会议上,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都是:此次教员政治学习运动是“自发的”“以改造思想为鹄的,不超出这个范围”“不涉及个人历史问题”“若要把政治问题包括在内,势必把他们嚇走,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问题上想象力的极限,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不限于他的理解与把握。

三

马寅初呈信周恩来之际,北大也呈信高教部。高教部迅速召开会议,认为这种学习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都是必要的,并呈请政务院,决定组织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的3000多名教师,同时进行改造思想的学习,并且准备利用北大、天津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展开这个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尽管事态发展在计划和意料之中,但事情性质的变化一时未被马寅初等许多当事人所意识:思想改造逸出“自发的”界限,进入体制化运作轨道。

9月24日,周恩来召开以研究京津20所高校开展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会议,“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马叙伦,委员有北大、清华等20所高校的校长。总学委员下设“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京津各大学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

会议商定,这次政治学习方式是通过听报告和阅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时间定为四个月。总学委颁布十二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的有关文章作为学习文件。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决议指出:这次学习要防止不联系自己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零星琐碎的技术批评。应实行有原则性的政治批评,才能提高自己帮助别人。为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学习的经验,总学委决定出版一种学习报,作为领导这次学习的工具。高教部部署的“改造思想”政治色彩贯穿其间,已经让知识分子颇感压力了。马寅初当时正在兴头,对其后果尚未觉察。

为了使教师们对学习运动能有正确的认识,9月2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各校师生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报告共讲了七个问题:(1)立场问题;(2)态度问题;(3)为谁服务问题;(4)思想问题;(5)知识问题;(6)民主问题;(7)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涉及到了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严肃的问题,并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坦诚地亮出自己的社会关系亦非工农,本人也需要改造思想,号召各高等学校教师认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报告结束,掌声雷动,马寅初亦深受感动。短时间内,各校校长和教师纷纷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为了迅速在全国范围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1月4日,政协第三次会议闭幕后,刘少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马寅初致周恩来信》。

奇专门作了《关于共产党员条件》报告。11月28日,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指示“今后各校分学习委员会要切实负责领导教师们的学习,各校负责人必须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来。”总学委会抓紧落实,除具体组织学习文件外,又聘请报告员20多人,辅导员和联络员10多人,分别到各校辅导报告,并协助各校分学会进行工作。同年12月,科学界、文艺界相继成立“学委会”,发起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马寅初作为华东区学委会主任于1952年1月来到华东,传达京津学习运动的初步经验。他发表记者谈话“本来普遍存在于高等学校教师中间的改良主义思想发生了动摇,对思想改造已有了强烈的要求”“如果一九五〇发起思想改造运动,由于客观条件还未成熟,必然会欲速则不达。推迟到明年或后年,又嫌太迟了,因为这将落后于当前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当记者问到这次运动的情况、经验和收获时,他高兴地说:经过这次运动,“过去不积极的人变积极了,不发言的人发言了。过去只翻一翻文件,不求甚解的人,现在也知道是错误的。”^[3]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马寅初,此时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对行政权力介入思想改造的后患尚未深察。然而到1952年3月,马寅初从高兴转为忧虑。

四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宣部机关刊物《学习》杂志连续发表于光远、许立群、艾思奇等人文章,“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体制通过权力强制思想转变之势日益强化,使高校学习运动从方式、手段、性质、目的都发生偏差,已不再是高校自发的学习运动,而转化为全国性的全面批判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疾风暴雨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北大自1952年1月21日成立“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后,原来的思想政治学习活动演变成“洗澡”运动,原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走向揭露、批判和挖老根,思想改造运动完全超出马寅初的理解与把握,他的担忧变成了现实。以法学院教授周炳琳为代表,北大有20多位教授和30多位助讲不配合运动,甚至抵制,学校的正常教学也受到了影响。马寅初因政务繁忙,其实并未亲身参加北大思想改造运动,此时听了北大分学委的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试图将运动引回“自发”、温和的途径,于是一面召开会议研究方案,一面组织参加对朱光潜、周炳琳的思想改造大会。因马寅初的安排,会议开得比较平和,周炳琳也认为这样的会对他确有帮助,并表示愿意与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1952年4月18日,马寅初主持召开北京大学委会,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他避开体制的流行语言,温和地说“周炳琳不贪污,是个好人,像周炳琳这样的同志,改造过来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北大党委将会议情况上报北京市委,4月20日,彭真又将情况呈报毛泽东,并附上《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4月21日,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能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4]37}

1952年5月6日,马寅初主持召开北大分学委会,各学院汇报后,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复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马寅初看准时机,希望适时结束已让知识分子心惊胆颤的政治运动。然而,5月10日,根据上级指示,工作组进驻北大,并改组北大党组,由上级派遣的袁永熙负责进一步深入开展思想改造运动。5月30日,北大召开“分学委会”和“节委会”联席会议,开始转入思想改造运动的最后阶段——“忠诚老实”运动。工作组党组书记袁永熙宣布:自5月31日起全校停课,职员停止办公。运动领导机构为:分学委会、节委会、各基层委员会、各小组。一般性问题由小组提到基层委员会批准处理,一般性政治问题由基层委员会提到校分学委会和节委会处理,比较重大的问题由校分学委会和节

委会提到北京市委批准处理。5月31日“忠诚老实”运动正式开始,至6月8日宣布胜利完成。6月28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会”成立,开始进行院系调整。^{[4]538-539}

这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变得缓和。1952年9月,这场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随着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完成而结束,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没有终止。1952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校务会议通过成立“教员政治学习委员会”,马寅初任主任,全国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学委会”。此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的一项日常工作,其影响与后果自是马寅初难以预料的。

参考文献:

- [1]周恩来.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M]//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0.
- [2]马寅初. 职员暑期学习[M]// 马寅初. 马寅初全集(第14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96.
- [3]王真. 马寅初校长谈思想改造[N]. 当代日报, 1952-02-03.
- [4]王学珍.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7.

The Comprehension and Assurance of Ma Yinchu o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Thought-reform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PRC

MA Da-cheng

(*Museum in Memory of Ma Yinchu* , Hangzhou 310006 , China)

Abstract: Thought-reform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PRC, which was call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was organized automatically by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on large-scale. Peking University is a national mod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inchu Ma, who was the headmas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became the vanguard of the revolution.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suggested critics held positive recognition on Yinchu Ma's contributions. And in recent years, articles which reflect "thought reform" ar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on academic field. However, they are both lack of original data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Yinchu Ma's own comprehension and assurance on thought-reform revolution. He always marched at the forefront, but held the different concept with government's vision. And the "purification" phenomenon which occurred in the revolution was certainly not his desire.

Key words: Yinchu Ma; political study; thought reform; educ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 陶舒亚)